

编者按

万历十五年(1587年),对于大明王朝而言,或许只是极为普通的一年,但对于海瑞和王用汲这对好友而言,却是不寻常的。

这一年的十月,海瑞病了。从正德八年十二月廿七日(1514年1月22日)海瑞出生,到万历十五年十月病重,已近74个年头。病危的他拒绝用药,拒绝就医。

十月十六日(1587年11月15日),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。海瑞无子,此刻身旁除“二媵四仆”,仅有一任职于户部的广东同乡苏民怀。虽然官至都御史,但海瑞也无甚身后物值得收殓。周晖在《金陵琐事·刚峰宦囊》中写道:“都御史刚峰海瑞卒于官舍,同乡宦南京者,惟户部苏民怀一人。苏检点其宦囊,竹笼中俸金八两、葛巾一端、旧衣数件而已。”苏民怀与海瑞生前同仁王用汲一起帮海瑞沐浴、更衣、入殓。



扩建后的海口市海瑞文化公园。 海南日报记者 陈若龙 摄

刚直君子 和而不同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杰华

同类相吸

而这位王用汲,远不仅是海瑞“生前同仁”这么简单。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,都曾被罢官,又在之后同时复任并成为南京“同仁”,卒后都被追赠为太子少保,都享有“刚正”的名声。

王用汲,隆庆二年(1568年)进士,历任淮安府推官、常德府同知、户部员外郎、南京刑部尚书。这段仕途尚算顺畅,直到万历六年(1578年)。

那年,万历皇帝大婚礼毕,首辅张居正便递上《乞归葬疏》,要回湖北江陵老家葬父。张首辅这次衣锦还乡的场面可谓极其风光,除了队伍庞大、仪仗肃穆外,还配有戚继光所委派的鸟铳手。湖北当地的官员接到返乡的张居正自然个个都是屁颠屁颠,忙前跑后的。可偏偏就有例外,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巡按湖广的赵应元就“不入流”,居然根本不睬首辅大人的衣锦还乡。张首辅车驾刚进湖北,赵应元就收拾好行囊,写好假条走了。张居正当然不干,于是便要赵应元除名。

“万历六年,首辅张居正归葬其亲,湖广诸司毕会。巡按御史赵应元独不往,居正嫌之。及应元事竣得代,即以病请。金都御史王篆者,居正客也,素憾应元,且迎合居正意,属都御史陈劼劾应元规避,遂除名。”(《明史》)

这时候,王用汲出现了,他上疏万历帝,说:生病是常有的事情,在座各位哪位没有请过病假?你们都被弹劾除名了吗?那为什么就赵应元例外?(“夫疾病人所时有,今在廷大小诸臣,曾以病请者何限?御史陆万钟、刘光国、陈用宾皆以方事引疾,与应元不异也。劾何不并劾之?”《明史·王用汲传》)他在奏疏的最后直接将此事上升至国家管理层面,说:“夫福福者,陛下所当自出;乾纲者,陛下所当独揽。寄之于人,不谓之旁落,则谓之倒持。”张居正看到这份奏疏,自然是怒不可遏,欲将其下狱廷杖,幸好有张四维从中调停才得以免除,但王用汲还是被削籍为民。

彼时的王用汲与海瑞虽尚未有交集,但二人的脾气确已是高度相似,都是铁骨铮铮。所以道光《晋江县志》评价王用汲“直声震天下”,《明史》称他“为人刚正,遇事敢为”。

他们俩的相遇,是在万历十五年。王用汲万历六年被罢官后,直到万历十年才重新被起用,历任南京工部郎中、尚宝司卿、大理寺右少卿、顺天府尹等职。万历十五年三月,王用汲调任南京,任右副都御史兼提督操江,这时,王用汲与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海瑞见面了,二人正式成为同仁,王用汲是海瑞的直接下属,直至当年十月海瑞病逝。七个月的共事时间虽短暂,但对于两个品行极度相似的人而言,却足够让他们成为朋友。

然而,这对朋友对待同一个人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,存在着巨大的分歧。

海瑞,深受王阳明的影响,视王阳明为榜样。先说立志。王阳明自小便认为“读书为圣贤”乃天下第一要紧事,海瑞和王阳明一样,自少便以去私、存心、养浩然之气为修身的标准,“以圣贤为必可为,以天下为己任”,正如其在《严师教戒》中说的那样:“君子能降师亲友,则雾扫空澄,纤毫不苟,浩然之气塞乎苍冥……有此生必求无忝此生而后,无忝者,圣人我师,一一放而行之,非今所竟跻巍科,陟臚仕之谓也。”再说为人。王阳明的学生周积辞行时,曾问教于王阳明,王阳明沉默良久只说了三个字“要立诚”。何为诚?就是不自欺,不欺人,不欺天地幽冥。海瑞也一样,最反对的便是为人不诚。他反复强调做人不能太“乡原”。何为乡原?用今天的话来说,便是伪善者。乍一听,乡原似乎也不是什么“大恶”,但其实,乡原是危害极大的,且是极具传染性的。因为乡原的“伪善”,让乡原很难“现形”,而不现形则无法“抓现行”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,乡原是极能讨到好处的。这样一来,乡原反而成为榜样。这种“低成本低风险却保收益”的做法,像传染性病毒一样,随着“同乎流俗,合乎污世”的一顿传播,真正的“德”者反而成为异类,成了被排挤的对象。

海瑞所不想成为的便是这种人。他说:“今天下惟乡原之教,人人最深,世俗群然称僻性,称太过者,多是中行之士。而所谓贤士大夫善处世者,或不免乡原之为。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。今人不为大恶,必为乡原。”(梁云龙《海忠介公行状》)海瑞认为“坏人”分两种,大恶之人与乡原之人。大恶往往可以避免,而要避免自己成为乡原之人才是最难,于是他要求自己“惟务识真”,要“率其真而明目张胆终身行之”,要“直道而行”,以防堕入乡原之列。所以他敢于“骂”嘉靖不务正业,敢逆大流收前首辅徐阶之私田……

可以说,不论是在立志,还是为人上,海瑞都是极推崇王阳明的,所以他才会称王阳明为“多才多艺之圣人也”。

而王用汲却不大认同王阳明,甚至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是邪说。万历十二年(1584年),从万历二年便开始关于王阳明从祀于孔庙的讨论终于进入尾声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记:“至十二年,而御史詹事首倡议,则又荐献章、守仁,而不及居仁,南科钟宇淳,亦同其义。乃科臣叶遵、主事唐鹤徵,又只主守仁一人。上下诸疏会众议之。”讨论在当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,次年即万历三年,王用汲专门就此事上疏对王阳明从祀孔庙表达了强烈的反对,《万历野获编》记:“大理少卿王用汲,则单疏劾守仁为悖叛朱晦庵,且谓守仁曾置朱熹为夷狄禽兽,至造其像鞭扑之……”王用汲认为王阳明公开批判朱熹学说是当之不当之举,并且认为王阳明曾骂朱熹为“夷狄禽兽”,又鞭扑朱熹雕像,实在是不配祀于孔庙。后来还是万历帝亲自下旨称“守仁、朱熹学术,互相发明,何尝因此废彼”,才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。

且不论王用汲所论是否属实,但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是极度不认可王阳明的。从王用汲协助处理海瑞身后事的举动看出,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往。《明史》记:“卒时,金都御史王用汲入视,葛帏敝,有寒士所不堪者。因泣下,醵金为敛。”

君子,和而不同。真正的知己,并不需要任何一方的迁就与一味地求同。承认并尊重彼此在个性及认知上的差异,这样的交往,才能称之为君子之交。很显然,海瑞、王用汲二人的交往,可称君子之交的典范。

海瑞病逝六年后,即1593年,王用汲也辞世。固
(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)

海口市琼山区忠介路上的海瑞塑像。
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